



太行战

兴山

山还是那座山，但在锡崖沟人眼里变得不一样了。

光棍多、文盲多、与世隔绝的凄苦日子，像太行山上凿开的碎石一样，被锡崖沟村民彻底丢进了谷底。

进入新世纪，为了发展王莽岭景区，当地政府凿通了一条直通锡崖沟的隧道，实现了锡崖沟与景区的循环交通。

近几年还修建了陵川县城到王莽岭景区的高速公路，下一步山西省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也将修到这里。

交通日渐便捷，锡崖沟到陵川县城开车只需30多分钟，来锡崖沟的游客每年少则10几万，多则20几万。锡崖沟村也被纳入王莽岭景区，每年仅出租挂壁公路景点的经营权就能收入16万元。

“但是这两年锡崖沟发展也遇到了瓶颈。”锡崖沟村现任支部书记杨阳说，环境承载力大大削弱，村民增收遇到瓶颈，已经到了不转型不行的时候。

多位村民说，每年夏天锡崖沟仅常住的避暑游客就五六千人，再加上散客，住得人满为患。游客吃喝拉撒全在一条沟里，污水、垃圾都往峡谷河道里倒。“村子红火了，村民们也有了钱，但无形中把环境也破坏了。”董山有说，没有了好环境，锡崖沟就没有了“根”。

村民们散乱的经营格局也难以维系。“锡崖沟产业同质化很严重。避暑的农家乐，你干我也干，你干什么我也干什么，哗啦哗啦，大家都上。价格上你50、我45，你45、我40，最终破坏了整个市场。”负责王莽岭景区经营的陵川县太行云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张青龙说。

越来越多的锡崖沟村民意识到，保住绿水青山才能有金山银山。

近两年，山西省晋城市对王莽岭景区进行了重新规划，准备将其打造为中国太行山脉的代表型龙头景区，锡崖沟村被赋予“太行天堂”的定位。根据规划，锡崖沟村要建成一个太行水镇项目，村里还有了对农家乐等进行集约化经营的想法。

一场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新战斗在太行山上打响。运行了近30年的锡崖沟挂壁公路得到治理，新建了挡墙、防护网。锡崖沟村内的道路重新进行了修建，河道治理也已完成了清淤，土石方开挖和回填等施工也在有序推进。涉及一半村民的旧村拆迁工作也基本完成，回迁安置项目全面开工。

锡崖沟村民的农家乐生意在2019年已经全部停止，许多过去建起的房子要拆除。一些村民不理解，董山有还帮着做工作。“老百姓的利益，政府肯定会考虑。将来统一重建，污水等统一处理，只会把环境搞得更好，等于是救了锡崖沟哩。”他说。

杨阳说，依托王莽岭景区升级，锡崖沟村正在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准备把挂壁公路、集体土地等集体资产，以入股的形式加入景区公司，到了年底分红，村集体有了收入，也能普惠到每位老百姓身上。整个景区建好后，老百姓有劳务收入、入股分红，还能自主经营农家乐、土特产等。

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着外出青年回流，锡崖沟振兴有了更多的人才支撑。现年37岁的牛胜利2001年考上大学走出大山，2019年4月返回锡崖沟，负责王莽岭景区网络监控等工作。“过去为了生存，大家都想下山。现在返乡，想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和景区提升改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他说。

亘古以来，太行群山岿然不动，大山脚下的山民却从未放弃抗争。这种抗争，凝聚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奋发图强的精神图腾，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的奋斗史诗，更昭示着新时代愈发美好的将来。

锡崖沟村民坚信：不远的将来，锡崖沟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亘古以来，太行群山岿然不动，大山脚下的锡崖沟村民却从未放弃抗争。”

从20世纪60年代初村民们异口同声的“修路！出山！”开始，寒来暑往，锡崖沟村民舍生忘死，只为走出大山。直到90年代，历经百转千回，村民硬是在太行山上凿出了“中国乡村筑路史上的伟大奇迹”。

进入新世纪，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引领下，一场环境保护与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新战斗又在太行山上打响。

锡崖沟村民因山困，与山斗，又因山兴。这种抗争和奋斗，凝聚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奋发图强的精神图腾，也昭示着新时代愈发美好的未来。

流沟又分别开始修筑两条通往河南景区的道路。

路通后，锡崖沟“世外桃源”的风貌立即吸引了众多游客。与此同时，山西王莽岭景区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挂壁公路也成为一个重要景点。

人流涌动，锡崖沟村民迅速捕捉到了商机。他们把自己的土特产拿到路边售卖，开起了农家乐，胆大的村民还买上汽车接送游客。宋志龙说，那几年，村民大概买了七八十辆汽车，每辆车一年接送游客至少要挣1万元，村集体门票收入每年也有10来万元。

经过几年经营，摸到门道的锡崖沟还依托天然的气候资源打造避暑产业。村民们纷纷把闲置的房屋腾出来，接待全国各地前来避暑的游客。曾参与修筑挂壁公路的董山有在2010年也开了一个农家乐。“生意很好，车天天停得满满的，最多的时候一年挣了20多万元，2014年我又修了一栋房子。”他说。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锡崖沟经营避暑产业的农户最多时达到190户，每到夏天全村6000个床位一床难求。村民每年仅农家乐一项收入就达到人均1万多元。

依靠旅游收入，董山有给三个儿子都置办了房子，娶了媳妇。“过去锡崖沟穷，只能吃玉米面、榆皮面，村里的娃娃们都嫁到能吃上白面的河南，村民们娶媳妇很难，修路时还组织过‘光棍团’。”董山有说，旅游搞起来之后，村里的年轻人不用再出去，每年夏天农家乐忙起来还得从外面雇人，一些迁到外地的村民都想回到村里。

村子红火起来，各项事业都有了发展。“我们小时候上学，走‘驴道’翻山下沟，走一天才能到古郊乡的学校。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回到家就不想往学校去了。”59岁的董山有说，村子红火起来之后，外面的老师也愿意来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学。

我给您当技术员，将来也帮您卖蜂蜜。”方同志这才放下了心，按照钟新华的方法养了4箱土蜂，当年果真卖了1000多元。如今，方同志已经养到了12箱，每年有3000多元的收入。

尝到甜头的方同志心眼活泛了。看到村里贫困户在扶贫工作队指导下，纷纷种起板栗，养了鱼，老方更加闲不住了，也在家门口养了100只土鸡。

“每只鸡政府补贴10元，中建三局再补贴10元。鸡苗和电费都解决了。”老方掰起指头给记者算起账来，每只鸡可以赚60元，今年就有6000元收入。

致富的方式越来越多。村里兴起来的养鸡和打板栗，又给方同志带来了收入。他有个祖传手艺——编竹器。每天吃过晚饭，老两口就开始编鸡笼和竹筐。“每个卖100元，去年差不多卖了100个。”



▲在太行山区山西省陵川县锡崖沟村的峭壁上，有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天路”的挂壁公路，公路全长7.5公里，从1962年开始修建，历时30年开凿建成。挂壁公路通车前，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锡崖沟村村民前往县城要花大半天时间。如今，锡崖沟挂壁公路已成为距县城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旅游景区。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本报记者晏国政、许雄

巍巍南太行，石崖林立。山西晋城陵川县境内，一条落差600多米、长约7.5公里的挂壁公路在悬崖峭壁上蜿蜒而下。这条公路因其奇险风貌，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前往参观。临崖而立，透过崖壁上大大小小的凿坑，一幅山民与命运不屈抗争的动图景忽现眼前。

半个多世纪以来，地处深山的锡崖沟村民因山困，与山斗，又因山兴。如今，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他们，再次站到命运的十字路口。

怨山

沿着挂壁公路来到锡崖沟村，俨然步入“世外桃源”：群山环抱中，穿村而过的红岩大峡谷流水潺潺，村民依山而居，一派水田园风貌。然而，过去几百年间，村民在这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看似怡然，实则困苦。

65岁的老支书宋志龙说，由于四周都是陡峭的高山，至新中国成立，锡崖沟通往相邻的河南省只有两条艰难的小道，一条叫“蚂蚁梯”，一条叫“老爷梯”，意思是神仙、蚂蚁都难行。村民们去陵川县城，要经由逼仄的古道翻越村后那道六七百米高的悬崖，平常得走两天。一到冬天结冰便寸步难行。

由于交通不便，锡崖沟村民几乎与世隔绝，过着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封闭生活。“村里自古多光棍、多文盲，村民有病只能硬扛，扛过就活，扛不过就死。”宋志龙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90%以上的村民都没出过山。

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县委书记骑马到锡崖沟调研，行至村后崖顶，再走无路可走。劳累的马匹走到悬崖边，往下面的锡崖沟村看了看，吓得往地上一卧，再也没能起来。书记一行相互搀扶着下到锡崖沟，问村民们有什么要求。

村民们异口同声：“修路！出山！”

很快，陵川县就给锡崖沟村拨了3000元修路款，用吊篮从崖顶滑下送到村里。这一年是1962年。三年过去，锡崖沟村修出一条1米多宽、八九公里长，从沟底通到崖顶的弯弯曲曲的山路。

“这条路除了人，只能走驴，所以老百姓叫它‘驴道’。村集体买了九头毛驴，从外面驮些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回村。因为路太艰险，毛驴都曾摔死过几头。”宋志龙说。

即便如此，村民仍然欢欣鼓舞。锡崖沟有史以来终于有了一条能走交通工具的“出头路”。

斗山

有了路，便有了希望。娃娃们可以外出读书，村民们也纷纷走出大山。经常外出的锡崖沟村民发现，外面的世界和村里完全不同，比如，外面有车。他们找到村支部，说：“我们也要修一条能走汽车的路！”

说干就干。1976年，村支部组织起了修路的劳力。村民们热情高涨，却缺乏技术，更没有钱。靠着土办法从下往上修，越修越困难。修修停停，花了快三年功夫只修了1公里多，怎么也修不动了。

这条断头路没能把汽车开进来，却把山上的狼引了下来。牲畜屡屡被狼祸害，村民们恨恨地说，这是“狼道”。

被大山压了几百年的锡崖沟村民，越想越不甘心。

1979年，锡崖沟再次修路。这次想的办法是打一条穿山隧道。这一年，在部队当了几年工程兵的宋志龙复员回村。勘察一圈之后，他告诉村民，隧道修不成。没钱没钱没技术不说，打进去之后连氧气都没有，放一炮，烟都出不来。村民们不服气，继续挖，结果一年下来只挖了32米。去向县交通局，人家说：“按你们的进度，80年也修不通。”

“因为‘狼道’，大家对修路失去了信心，有的村民干脆迁往河南，一气儿走了200多口人。这次参与打隧道的大部分都是光棍，指望修通路，去外边讨个老婆。可一听说80年才能修通，就全都蔫了。”宋志龙说。

此后，有一个放羊的村民，在“隧道”里圈放了100多只羊。老百姓就说，路没修成，又给放羊的修了个“羊窑”。

经历了“狼道”和“羊窑”的失败，锡崖沟村民再也不提修路的事。直到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通过“驴道”吹进锡崖沟。

“要想富，先修路。”不甘贫穷的村支部召集村民开会，再提修路。会上，没了心劲儿的村民说，我们这样自给自足就挺好；还有人问，修了几次也没修好，这次就能成？

会开了八天八夜。经过村干部包自然村、党员包户挨家挨户做工作，村民们最终统一了思想：为了好日子，再干一场。

出山

1982年底，锡崖沟村民再上太行。这一次，只能成功不容失败。

山区修路本就不易，在锡崖沟修路更难。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村民决定依山就势从崖顶往下修。“每修一段，就离家近一点，村民们就能看到希望，修路也有劲头。”宋志龙说。

别的地方是修路，锡崖沟村民却是在悬崖峭壁的坚硬岩石上凿路。没有技术不行，宋志龙和另外两名当过工程兵的村民，带着30多位青壮年边修边学。他们腰绑麻绳，手持钢钎、锤子，在太行山上一个坑一个坑、一个洞一个洞地凿了起来，两年才凿了130多米。

宋志龙说，那时年轻人上山修路，老年人在村家种地。每年正月“破五”就上山，临近年根才下山。修路的人常年住在山顶的大石头下或者半山腰的崖洞里，即便轻伤也不下火线。“锤子把手砸

流血了，抓把土把伤口盖上，继续干！”

寒来暑往，众志成城。到了1989年，终于只剩下崖壁中间的300米尚未贯通。这最后的300米，也是最硬的“骨头”。“我带人上去放炮，一放炮就塌方。”宋志龙说，光1989年到1990年两年间就塌方50多次。

因为塌方，一些人不敢干了，最后只剩宋志龙带着12名亲戚、同学坚持。有一次大面积塌方，差一点把他们全埋了进去，塌下的山石用载重5吨的卡车拉了10次才清理干净。

村民们说，这条路是拿血汗乃至性命换来的。1990年农历十一月，在一次放炮作业中，村里的老支书和一名村民双双被炸身亡。在这前一天，还有一位村民被石头砸断了腿。

30年，三代人。锡崖沟村民舍生忘死，只为走出大山！

1991年6月10日，锡崖沟村民耗费近十年时光凿出的挂壁路正式贯通。望着从崖顶开下来的一辆卡车，村民们如痴如狂：他们终于有了一条“能走汽车的路”。

近十年，动用义务工10.8万个、开挖土石方23万立方米、牺牲两人、花费59.6万元……锡崖沟人在太行山上凿出了“中国乡村筑路史上的伟大奇迹”。

“吃”山

挂壁公路，凿开了太行山，也砸碎了锡崖沟人身上的禁锢。

锡崖沟西北紧靠王莽岭、东南与河南天界山景区相邻。这两个地方都是南太行胜境。过去因为没有路，锡崖沟与世隔绝。修通了挂壁路，锡崖沟人外出一看，发现这山山水水也能挣钱。

锡崖沟村支部决定，靠山吃山，开发旅游。

他们一边整修村子下面的红岩大峡谷，一边继续修路。这次修路，是通往河南。“河南那边的景区开发早，游客也多。我们虽然与他们相邻，但游客过来很不方便。”宋志龙说，1993年和1999年，锡

崖沟人放下心来，按照钟新华的方法养了4箱土蜂，当年果真卖了1000多元。如今，方同志已经养到了12箱，每年有3000多元的收入。

尝到甜头的方同志心眼活泛了。看到村里贫困户在扶贫工作队指导下，纷纷种起板栗，养了鱼，老方更加闲不住了，也在家门口养了100只土鸡。

“每只鸡政府补贴10元，中建三局再补贴10元。鸡苗和电费都解决了。”老方掰起指头给记者算起账来，每只鸡可以赚60元，今年就有6000元收入。

致富的方式越来越多。村里兴起来的养鸡和打板栗，又给方同志带来了收入。他有个祖传手艺——编竹器。每天吃过晚饭，老两口就开始编鸡笼和竹筐。“每个卖100元，去年差不多卖了100个。”

新华社香港1月14日电(记者李滨彬)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14日在香港出席第13届亚洲金融论坛时表示，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在过去20年时间里，中国让很多人脱离了绝对贫困。在过去30年全球消除贫困的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此前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班纳吉和其他两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班纳吉表示，现在在中国遇到了一些新挑战，人民对生活和经济期望水平越来越高。但中国会继续领跑世界经济，在消除贫困方面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赞中国消除贫困成就

出新的表率。未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更高，但还会有很多人需要进一步努力，这是接下来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班纳吉说，中国在解决贫困和社会公平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和改善。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增加速度远远超过预期，未来显然会有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说如何进一步减少贫困和进行新的财富分配等。

有研究表明，大约30%的工作有可能会受到自动化挑战，到2030年30%的工作会消失。

班纳吉表示，自动化不是坏事情，但是必须要做好必要的善后与跟进机制，让受影响人群也能够体会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

新华社武汉1月14日电(记者徐海波)“今年大丰收，贫困户可以过个好年了。”站在方新垌村冻库前，望着一批批送土鸡来冷冻储藏的贫困户，村支书方汉兵笑着对记者说，武汉的一家公司食堂以每只120元的价格，从全村贫困户中收购了1700只鸡。仅这一项，贫困户就增收20多万元。

而几年前，每到年关，方汉兵和村干部们都要犯愁。“许多村民家太穷，年关难过啊。”

位于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湖北省团风县但店镇方新垌村过去是远近闻名的穷山窝。全村480户人户中就有18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过去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老人小孩生个病都没人送去医院，总让人不放心。”方汉兵说，碰上刮风下雨，还有房屋倒塌的危险，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更是不

脱贫攻坚，方新垌成了“放心湾”

放心。

各家困难千千万，扶贫从哪下手？中建三局驻方新垌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李恒说，工作队进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扶贫档案。队员们挨家挨户走访考察，分析每户致贫原因，并为其量身定制帮扶对策。

今年72岁的方同志是方新垌村的贫困户。十多年前的一场大病，让他家陷入贫困。老两口靠两亩薄地维持生活。扶贫工作队了解他家情况后，主动上门鼓励他们开展蜜蜂养殖。

“那东西不好养。”种了一辈子田的方同志觉得养蜜蜂简直是天方夜谭。十几年前，他尝试着养过几箱，总是养不活。

扶贫工作队队员钟新华出生在江汉平原一户蜂农家，了解到方同志曾有养蜂经历后，鼓励他重操旧业。“您放心！

我给您当技术员，将来也帮您卖蜂蜜。”

方同志这才放下了心，按照钟新华的方法养了4箱土蜂，当年果真卖了1000多元。如今，方同志已经养到了12箱，每年有3000多元的收入。

尝到甜头的方同志心眼活泛了。看到村里贫困户在扶贫工作队指导下，纷纷种起板栗，养了鱼，老方更加闲不住了，也在家门口养了100只土鸡。

“每只鸡政府补贴10元，中建三局再补贴10元。鸡苗和电费都解决了。”老方掰起指头给记者算起账来，每只鸡可以赚60元，今年就有6000元收入。

致富的方式越来越多。村里兴起来的养鸡和打板栗，又给方同志带来了收入。他有个祖传手艺——编竹器。每天吃过晚饭，老两口就开始编鸡笼和竹筐。“每个卖100元，去年差不多卖了100个。”

快过年了，方同志盘算着自家的收入，心里乐开了花。如今，老两口不再舍不得吃喝，总托人从镇上买些牛奶、藕粉和营养品回来。“现在有钱赚了，心情舒畅了，身体比原来更好了。”

针对留守在家的孩子们，扶贫工作队通过各种渠道，募集大量校服、图书、课桌等物资，改善村小学教学条件，并设立“建证”教育基金吸引优秀教师来村教学。

为了帮助孩子走出内心的孤寂，工作队还从中建三局女职工中为每位留守儿童选配“爱心妈妈”。“爱心妈妈”不定期到结对儿童家中或学校走访，陪他们过节，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平时还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家长或老师保持联系。

“脱贫后，不仅我们干部放心了，方新垌人都放心了。”方汉兵说，如今，方新垌村已整村脱贫出列，正在巩固脱贫基础，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示范村。